

第四章 權力與真理——中共與傾左知識份子

1950年代，從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等接連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成爲突出的重點。現有的研究成果顯示，「黨化知識份子」（如郭沫若）與「獨立知識份子」（如陳寅恪）是中共建政後中國知識份子的兩大類型。實際上，在1940至1950年代時，有一群知識份子既不是中共黨員，又與一般理解的獨立知識份子在政治與學術的態度上不同，而是企圖認真把舊有所學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有機連結，甚至轉向馬克思主義，因而在政治態度上與中共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配合，本文故而歸類爲「傾左知識份子」¹。一旦這些傾左知識份子，其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與中共官方有所不同時，會有什麼結果？本章將以馬寅初爲例，探討他在1930年代以後的言行作爲，試圖構建出此類「傾左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及其處境。

本文所謂的「傾左」，意指知識份子在政治立場上原本不支持，但日漸傾向共產黨，以及思想上原本有其自身主張、但日漸接受馬克思主義。因而在概念界定上，一方面，「傾左」是一個過程，故而所謂「傾左知識份子」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另一方面，「傾左」不但表現在知識份子的政治立場上，同時也表現在思想轉變上。並且，思想上的向左轉，明顯於組織上的認同。這使得「傾左」與「左傾」之間的界線較爲明確。

中國共產黨出現在中國，一開始便是左傾知識份子組成的。然而，曾經參與延安整風運動的知識份子，之後大都已成爲中共黨員，過著組織生活，其言行的獨立性相對於一般知識份子而言較少，多半成爲學術、文化界的官方代表，並參與制訂知識份子政策。故本文將其排除在「傾左知識份子」之外。因此，本文所說的「傾左知識份子」群體，除了在概念界定上有如上述，就時期而言，則專指1940年代以後，到1950年代初期，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開始傾向認同中共或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這群人的命運與前期的知識份子大不同，在政治上的遭遇大多不如1930年代即已轉向的知識份子，有的甚至於在反右運動期間被打成右派，是這群人的另一特徵。

第一節 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的關係

要理解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一方面必須注意到「何謂知識份子」，這屬於概念界定的問題，一方面也必須說明「誰是知識份子」，即知識份子的社會／

¹ 「傾左知識份子」一詞的使用，由於筆者特別強調其動態性（從右／中轉向左），故很難以一個相對應的英文字或詞組作爲對應。

歷史角色。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就是從一群知識份子出發的話，我們就必須還要考慮到另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什麼是中共」，或者說，中共在不同時期的角色變化，對它如何對待知識份子，會有什麼影響？

關於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中國大陸或者礙於政治因素，研究和討論始終未能展開，大多停留在個案研究上，或是純然的政治控訴。台、港、海外等地區近年以來卻頗有跳脫黨派立場之灼見。

余英時在討論中國現代的知識份子的時候，是以知識份子的社會／歷史角色來看的。他首先強調此一群體與中國傳統的「士」有所不同。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士」號稱「四民之首」，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在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古代思想氛圍中，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士的地位為現代知識份子所取代，如果真要劃分一個界限，那麼 1905 年廢除科舉，新式學校和東西洋遊學成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現代知識份子，而傳統的「士」便退出歷史主流之外。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有一共同之點，即在「打天下」的階段必須以邊緣人為主體，但在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則必須逐漸把政治主體轉換到「士大夫」的身上。現代革命則是在中國社會結構逐步解體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革命奪權以後，政權的繼續維持已不再有一個「士大夫」階層可資依靠了。社會解體產生了大批的邊緣人，怎樣把這一大批邊緣人組織起來，佔據政治權力的中心，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主要課題。然而這些現代知識份子，從戊戌變法到中共建政，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從參贊機要到被改造的對象，一路走向邊緣化，尤其 1924 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和直接師法蘇聯的共產黨是兩個程度不同的邊緣人集團，這些邊緣人佔據了政治中心之後，知識份子反而不斷從中心撤退，直到完全邊緣化為止。²余英時提出這樣的趨勢，看似合理，但是前提是知識份子是否可以視為單一的整體，尤其是像一般的社會階級一樣，具有共同的身心狀態和客觀利益，或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樣的說法就很難成立——1920 年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純粹就其政治態度來看，就已極為分殊化：依附北洋政府儘力維持中國政治局面者有之，投入國民革命者有之，加入中共者有之，這些知識份子的不同政治取向，大多不是見利忘義之舉，合理的解釋應是他們對當前的政治正統以及中國未來的前途有著不同的認知，進而導致其政治上的分殊化。其次，按余英時的說法，國民黨和共產黨是邊緣人團體，在取得政權之後仍對知識份子有所距離。可是這兩個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已經居於權力中心地位，便已非邊緣團體。況且，當國民黨當政時，親共知識份子固然備受冷遇打擊，相對的，親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卻可一展長才，或興學辦報，或參贊機要，反之亦然。因而其與各派政治權力的關係遠近極相關連，也未必就一定邊緣化。

²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總第 15 期，2003 年 6 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100057.htm>。

許倬雲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則加上了概念界定的處理。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可大體分為四種類型，借用宋儒張載的話來比喻，分別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強調，一個知識份子要同時達到這四個維度頗為不易，但只要堅守其一，便可稱上是知識份子。同時，在這樣的分類中，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知識份子，可以歸類為第二種，即「為生民立命」者。然而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全盤西化的五四人物與左派的馬列主義者，他們對於西方的系統全數套用，在西方的概念分類上，這兩類人物其實是「intelligentsia」，而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的知識份子，是指在本國的文化系統之內做他的解釋工作，懸掛理想，做良師良吏。「Intelligentsia」的知識份子則是將其它文化的思想體系全面移植，也因此常面臨水土不服的困境。面對此一困境，這兩類人往往不是改變植物（思想），而是改變土壤（國情）。³此一說法，如果對照民國初年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以及中共早期在中國政治社會層面的角色扮演，頗為恰當。尤其是，在許倬雲看來，知識份子是具有多種類型的一群人，因而不能只把他們看成單一的整體。但是，如果對照中共建政之後知識份子的情況，許倬雲的看法就必須有所補充。一方面，中共建政初期的確可以說全面的「以俄為師」，但是 1956 年前後，「反思蘇聯模式」便已成為一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中共高層之間廣泛討論，換句話說，自此以後，中共的高層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開始有了自主性的判斷，因而到了這個時期之後還將中共視之為 intelligentsia，似乎不妥。另一方面，歷經數十年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以及 1949 年取得政權之後，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早期中國共產黨，是否還保有知識份子的身心狀態，也值得考慮。此外，從許倬雲對「intellectuals」和「intelligentsia」二個名詞的區別可知，其間的標準，係以民族或國家作為內外之分際，並以此界定「intellectuals」和「intelligentsia」的角色扮演。以中共和國民黨這兩群早年都是以知識份子為主所組成的革命團體而言，光是以民族或國家的界限來認知這兩個團體，似乎也是不足的。他們的政治主張和中心思想，雖說都有外來的成分，但是畢竟這兩個團體都有企圖將西方思想和中國本土情況相結合，1920 年代孫中山以五權憲法代替三權分立，1940 年代中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都是明証。

因此，余英時所說的「士」和知識份子，都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待，因而其社會角色和位置相對清楚，但無法藉以理解知識份子內部的分殊性。許倬雲的知識份子類型論，有助於了解知識份子的內在理路，卻不易辨明其所處之外在社會角色和位置。

至於中共建政之後其與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魏承思則以「工具化」一詞形

³ 許倬雲，「歷史上的知識份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份子」，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學院系列講座，2006 年 11 月 29 日。

容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共治下的遭遇和歷程，並指出工具化是中共對待知識子的政治傳統。此一趨勢發端於 1930 年代上海文委（中共文化工作委員會）建立之時，而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以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所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明確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向，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立場的政黨，黨的知識份子要站在黨的立場發聲，成為革命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建政之後，這些黨化或工具化了的知識份子大多成為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並逐漸官僚化，而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則是知識份子全面工具化的開始，並持續到文革和改革開放時代。儘管在反右前後，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都曾有過一段相對寬鬆期，但是魏承思認為，「寬鬆與嚴厲，教化與強制，區別只在於如何使知識份子成為工具以及更有效地發揮他們工具的作用。」⁴

此一理解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部分。首先，在魏承思上述的「工具化」論斷中，隱含了一個判斷的標準，手段的鬆緊不是判斷中共對待知識子態度的標準，而是是否要求並強制知識份子與當前政策的口徑一致。這樣的判斷基準立論頗新，同時也為深入理解中共與知識份子的關係頗有助益。但是這樣的判準無法涵蓋下列這樣的情形：某些知識份子，雖非中共黨員，但其自主意識與共產黨理念一致，贊成當時中共的政策主張，那麼這些知識份子是處在工具化的情境，抑或是他自身獨立性的發揚？以本文所要討論的個案馬寅初而言，自始至終不是中共黨員，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可說是首倡者之一，在整風運動、反右運動和大躍進期間，其政治大方向基本認同中共的政策，嚴詞反駁那些批評中共政策的人，也曾提出自己對於時政的看法而遭人批評。另外還有一群可能為數不少、但是知名度不大的人，在中共建政前即已加入中共，但仍保有知識份子的身分，或者說，仍一直沒有放棄思考和研究問題，但他們的想法卻與中共的主流相抵觸（儘管他們也往往自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還會惹禍上身，像是顧準。這兩類人要用「工具化」的概念來涵蓋，便顯得牽強。其次，「工具化」概念，係魏承思觀察了中共長期歷史發展為基礎。從 1930 年代至改革開放，魏承思認為此一傳統並未中斷，即使出現過相對的寬鬆期，也只是「軟硬兼施」手法中的軟性表現，而不是工具化方向的動搖。如果從周恩來、陳毅和薄一波在 1956 年和 1960 年代初的說法來看，的確有此一傾向。⁵但是，1956 年雙百方針的提出，若也被理解為只是工具化的軟手段，是否恰當，有待商榷。筆者認為，「工具化」概念對於理解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極為重要，而魏承思也在其書中以長期的歷史觀察獲致此一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趨勢。可是此一趨勢並不是沒有方向改變的可能，至少整風運動曾經企圖改變工具化的趨勢。⁶

前述這些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文探討中共與知識份子關係的

⁴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與沈**（香港：牛津，2004），頁 77-87。

⁵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與沈**，頁 84-85。關於這一點，本文稍後將進一步分析。

⁶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註 4。

角度和出發點。筆者認為，要把此一問題明確化，還必須考慮中共的自我認知及其對外在環境變化的認知。

如果考察中共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共的確也是在不停變化的外在環境，以及自身所處的角色當中，認知自我以及界定其與知識份子關係的。因此，這就牽涉到本章一開始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什麼是中共」？目前的出發點是，在中國現代史的不同時期，以及中共所處的內外環境，中共對自身的認知會有所變化，從而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便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不是單一的群體，因而當中共改變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時，並非所有知識份子都會因而受益或受害，而是有明顯的分殊化，而待遇的不同，關鍵在於中共政治的需要，與各類型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的政治態度。

關於「什麼是中共」的問題，或許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例子可作為討論的起點。匈牙利籍的康拉德（George Konrad）和齊蘭尼（Ivan Szelenyi）在1970年代指出，在東歐，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爲一種國家宗教，是新階級的統治意識型態。⁷這兩個人並不是反馬克思主義者，反而自詡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東歐社會主義的批評有別於其他歐美國家的學者，係以馬克思的理論檢視東歐社會主義的變化：

傳統馬克思主義說得沒錯，在自由市場的情況下，社會由優勢階級主導，知識份子總是來自少數那些階級，因此每個階級有其自己的知識份子。然而東歐的社會主義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建立，以及近年來多國經濟組織及科技導向全面的全球性霸權的建立，使得知識份子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產生變化。作為計劃經濟生產當中的計劃者，知識份子在社會再生產的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使得知識份子日漸形成一個階級。⁸

根據這樣的想法，康拉德和齊蘭尼認為，舊社會中的知識份子並不成爲一個階級，其政治態度也並非一致，而是「每個階級有其自己的知識份子」。可是到了社會主義之後，由於計劃體制的成立，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變化了，因而成爲一個有別於其他階級的一個階級。這樣的說法某種程度是從另一種角度表明知識份子的分殊性。然而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建成之後，知識份子卻形成一個階級，既然是階級，那麼就會有自己的階級利益和特徵，馬克思主義既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宗教化，便成爲了這個階級的信仰，並成爲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但是另一方面，知識份子這一群體又有著近乎是基因的東西，即企圖超越現狀、召喚普世價值並以此衡量所處社會的本然性，因而往往會有一些人跳脫出「知識份子作爲一個階級」（intellectuals as a class）的身分，而以一個知識份子（as an

⁷ George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trans. by Andrew Arazto and Richard E. Allen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79), p. xvi.

⁸ George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 9.

intellectual) 的身分發言。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會有，也只有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知識份子。⁹

儘管筆者不甚同意兩人所謂的「知識份子的基因」論調，但是除此之外，兩人所做的分析的確回應了幾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或許除了蘇聯以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員，在組成之前的階級身分，多半以上層階級為主，而這些人則多半又是當時社會的知識份子。歷經內政、外交重大變化，加上了戰爭的催化，成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自身的社會身分也因此而多變，並最終成為新國家的政治領導者，或者按康、齊二人的稱呼，成為一個新階級。同樣的一批人，在歷經了多重的身分變化，其身心狀態絕對不能僅以知識份子來看待，而一概將其視之為國家官僚，也同樣有以偏概全之虞。在尚未能有效界定這個問題之前，具體的經驗研究仍可進行，同時也是尋求合理解釋的唯一良方。因此，筆者將分析中共在不同時期如何對待「其它」知識份子，反照中共自身的社會角色變化，同時注意到這些角色變化對中共如何理解或詮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節 中共與知識份子：1920-1940 年代

孫中山在 1924 年間演講「三民主義」時，對「主義」(-ism) 一詞提出過一種類似於定義的說法：

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了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生出力量。¹⁰

這句話作為對 18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歐、美、英、日各種思潮的「主義」的定義，或有不足，但作為 20 世紀初期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何謂「主義」的理解，卻甚具代表性。

不論是孫中山自身提倡的三民主義，或是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或是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乃至於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這些「主義」不只是思潮，而且是救國之策。各種「主義」在中國被如此看待，應是中國所處當時國內外情勢使然：內有軍閥亂政，國步維艱，外有列強侵逼，命在旦夕。既然是救國之策，一方面各家各派自有主張，不容外人批評，甚至對別人進行批評。另一方面，既然是救

⁹ George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pp. 12-14.

¹⁰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 1。

國之策，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各種主張之間的志同道合者，往往集會結社、組成團體，或宣揚理念，或著手實施各種主張。

其他「主義」的團體且先不論，光是與共產黨或共產主義相關的各種派別和小組而言，在俄國革命之後就非常多，也非常複雜。早期國民黨黨員中的人如戴季陶、張繼等人，以及「正牌」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外圍團體，就不需多說了。早在 1911 年，江亢虎就在上海組成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之後又改組成「中國社會黨」，黨員人數一度達到 52 萬 3000 人，1913 年迫於袁世凱的威逼恐嚇而宣告解散。1919 年曾有一「無政府共產黨」，代表人物是劉師復，旋即以失敗收場。1920 年更是早有一個名叫「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立於四川重慶。同年稍後，「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姚作賓，同樣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同時期還有一個在上海由俞秀松等人組成的「社會共產黨」，還有國會議員胡鄂公，自組「共產主義同志會」，還發行機關雜誌，其會員一度高達一萬多人。¹¹

這些團體的存在，當時不論就出現的時間和社會影響力，有許多是不輸於、甚至更勝於「正牌」的中國共產黨。更有甚者，其中有些團體更早與俄共接觸。幾經波折，不過最終還是由「正牌」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治正統地位，陳獨秀則在先後幾位來華的蘇聯黨代表的幫助下，吸納了一些不同的組織和團體。¹²可是仍有一些團體和個人並未因此而與「正牌」的中共匯流，日後甚至成爲與中共對立的力量，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姚作賓，1938 年先是加入了華北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後來又成爲汪精衛政府的一員。儘管如此，多數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都被納編進入了中共的黨組織體系之中。自此以後，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權，隨著中共黨組織的建立，同時吸納了各方力量，日漸集中到了「正牌」的中共身上，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相關解釋，漸漸以中共的解釋爲準。¹³

另一方面，隨著政治鬥爭的發展，中共黨組織的功能日漸強化和緊密。尤其是到了國共分裂之後，雙方在高強度的政治鬥爭需要下，憑藉著自身的意識型態，都發展出高度組織化的政治／軍事集團。如此一來，就如歐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世界一般，教會的世俗權威與教義本身的神聖性互爲保證，共產黨組織的壯大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強調，

¹¹ 詳見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2-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無政府主義和中國社會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 291-295。

¹² 近年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著作多了起來，除了楊奎松上引之書也對此作了自己的見解之外，包括日本學者也有所發揮，詳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¹³ 由於蘇聯內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政治鬥爭所出現的托派，曾經一度對於中共的政治正統和思想正統造成威脅，由於過程頗爲複雜，在此先不考慮，詳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也確保了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的意識型態合理性與革命正當性。經由中共的武裝活動與報刊宣傳，中共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唯一代表，不但在思想的詮釋權上，同時也在政治的作為上。另一方面，中共歷經高張力的政治鬥爭的洗禮，也具備了高度組織化、高度內聚力的力量。以致 1930 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現實力量的化身，共產黨組織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是重合的，表現出實存的黨組織和其組織所奉行的思想的同一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奉行此一主義的共產黨組織，原本是不同層次的事物，有著不同的規範和界限，卻愈益合而為一，相對地，這就使得在思想概念或政治策略的不同層次的爭論，轉變成同樣高度的問題：反對黨中央的某個做法，將被直接視為反黨，而反黨就是反馬克思主義或反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反對某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性解釋，也會被看成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本身，而反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也等於反黨。因此，「思想與組織的同一化」這個現象，更廣泛說，「真理與權力的一致化」，是在理解中共對待知識份子時的一個大前提。¹⁴

中共建立前後，正是「社會主義論戰」進行之時，從這些論戰的背後和中共早期的組成體質都是知識份子來看，中共對於知識份子，尚未有清楚的界定。一方面，在論戰中，中共領導者對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和主張予以批駁，視之為論敵；另一方面，在 1920 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又把知識份子當成吸收的對象。「宣言」中宣稱：

共產黨的任務是要組織和集中這階級爭鬥的勢力，使那攻打資本主義的勢力日增雄厚。這一定要向工人、農人、兵士、水手和學生宣傳，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組織一些大的產業組合，並聯合成一個產業組合的總聯合會，又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¹⁵

請注意「學生」此一用詞，而不是用「知識份子」。如果考慮到中共最早的發起者，有許多人都具有教師身分，如中共一大的代表董必武、何叔衡、劉仁靜、陳潭秋等，更遑論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李大釗和陳獨秀，那便可以理解了。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情況和教育水準而言，受過高中、專科以上教育的學生，絕對稱得上是知識份子。不過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草創時期的中共，可以說沒有什麼具體的知識份子的政策，充其量，也只有盡力在知識圈當中宣傳他們的理念以招募同志。而以他們最影響到的知識份子群體，自然是以學生為主。至於當時已在中國各大學任教的高級知識份子，中共更難以影響。

1925-1936 年之間嚴酷的政治鬥爭，卻把中共這個知識份子黨，鍛鍊成了一

¹⁴ 關於這一點，後文將再進一步討論。

¹⁵ 「中國共產黨宣言」，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090/20010424/450614.html>。

個政治軍事爲主的政黨。1927年5月，即國共分裂之後，中共黨員共有約六萬人，其中工人黨員的數量已超過半數，達到53%，知識份子的黨員只佔19%。國民黨全面清黨之後，中共黨員人數陡減爲一萬人，可是隨即到1928年6月時，人數反而增加到十三萬人以上，主要是農民的加入。此時，工人黨員只佔10.9%，知識份子更只有7.2%，農民黨員卻佔了76.6%，還有5.3%的士兵黨員。¹⁶儘管如此，知識份子在數量上還是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決策圈的影響力上，知識份子仍是牢牢掌握權力。在1925-1928年期間，中共召開了三次全代會（四大、五大、六大），從歷次中央委員的組成名單中可以看到，其中出現了大批群眾運動當中有突出表現的人，許多是工人出身的工運份子，如關向應、向忠發等。但是知識份子出身的人，仍佔中共中央的決策地位的多數。六大代表成員中，工人出身的代表在二十三個委員中多達三分之一，算是歷屆代表當中工人人數和比例最多最高的。而儘管農民黨員大幅增加，但是並未反映在決策圈的結構變化。

這樣的組成結構，到了七大時產生了明顯的轉變。從七大的十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可以發現，工人出身的代表全部不見，同時增加了兩位軍方代表人物，即朱德和彭德懷。除此之外，都是知識份子出身的代表。中共歷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組成結構，可以看出其在黨員人數、黨員結構和當時的政治影響力，值得進一步討論。但本文的重點在於，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代表，經過這些年的政治和軍事歷練，是否還稱得上是知識份子？

以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來看，扣掉朱德和彭德懷，張聞天、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自此一直到建政之後仍能有各類型作品產出，或是詩詞，或是文章，或是讀書筆記。康生一輩子似乎沒有像樣的作品，但其生活品味和長期的工作內容，稱得上是知識份子。劉少奇除了政治需要的作品之外，讀書也甚爲勤快。至於其他人：周恩來、任弼時、陳雲、高崗、彭真，此後拿筆時往往是撰寫軍、政命令或工作報告，以及私人信件，真正意義上的各種類型的「作品」，即使只是鼓動宣傳的文章，也幾乎沒有了。這些人說是良吏，或許稱得上，但說是知識份子，似乎已經少了一些味道。

至於位處上海的文委和「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在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其所掌握的知識份子，論質論量都有一定的水準。但是他們在黨內的權力位階，遠比不上上述這些中央委員。不過他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尤其是1930年代，在一般社會上卻是很大的。中共中央與上海文委以及「左聯」的關係，雖有領導之名，可是在許多事情上並不是那麼一致，從田漢、周揚等人跟魯迅關於「國防文學」和「抗日文學」的口號之爭，以及關於「左聯」的解散等問題便可見一斑。¹⁷這兩個組織所吸收的共黨知識份子，大體上都是1927至1936

¹⁶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239。

¹⁷ 關於中共上海文委的人物和作爲的詳細情形，詳見徐慶全，**周揚與馮雪峰**（漢口：湖北人民

年間中共處於極為惡劣的政軍形勢下加入的。¹⁸論其對中共政治立場的堅定性，應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群體，在上述與魯迅之間的爭執，儘管毛澤東一再說要避免，並透過徐懋庸從中調解，但還是發生了。不過，從上海文委和「左聯」的表現來看，中共對於知識份子的吸收和爭取仍是不遺餘力的。

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中共取得了合法性地位，加上對外一再宣傳共同抗日的主張，因而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前往延安，賀綠汀、丁玲、何其芳、王實味等就是這批人中知名度較高的。¹⁹爲了吸納和收容更多的知識份子和年輕學生，中共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因此，在西安事變之後到延安整風之前，大量的知識份子到達延安，或受短期訓練直接參加工作，或就讀上述各級學校，卻與延安高度集中的軍事政治組織生活模式產生衝突。²⁰因此，延安整風運動除了中共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之外，如何將這些有著不太相同的政治理念和志向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統一起來也是重要的目的和動機之一。詳細經過在此且不表。毛澤東的話說得直接了當，當時中共要知識份子成爲文化上的軍隊：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²¹

要建立文化軍隊，就要統一思想。可是知識份子要組成軍隊，有其特殊困難，在中共的認知裏，又有更爲特殊的困難：

黨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份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份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份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

出版社，2005)。

¹⁸ 以著名的「四條漢子」爲例，除了陽翰笙早在1924年便已加入中共之外，其它人如夏衍、田漢、周揚，包括馮雪峰，都是這個時期加入的。

¹⁹ 丁、王二人都早已是中共黨員，但都由於某些因素與黨組織脫離，按中共的說法便是「曾經脫離組織生活」。

²⁰ 詳細的衝突例証，最突出的當屬王實味和丁玲的例子。

²¹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頁269。

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²²

這一類觀點，在毛澤東的歷來各種著作和發言時，時常出現，不足為怪，然而這一類的論點卻道出了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有了新時期的價值判斷，與之前不同。延安整風前後，正是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的分水嶺。延安整風之前，知識份子是被吸納的對象，前提當然是志同道合，認同馬克思主義，理念一致，無所謂改不改造。吸納進來、成為黨員之後，這些知識份子出身的人卻大多「不務正業」，轉向從事政治和組織工作，甚至學起軍事事務，並直接以組織紀律要求，即使連毛澤東、周恩來本身都是如此。可是延安整風之後，外界的知識份子固然還是要爭取，但這些新加入的知識份子黨員，首先被要求改造，要丟掉知識份子的架子，同時也要試著接受馬克思主義。經過教育訓練之後，將成為中共在文化戰線上的戰士，不過比起他們的前輩而言，至少業務內容仍屬於文藝和學術領域，甚少有「不務正業」的問題了。這一類的代表人物例如何其芳，1938年夏季前往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1942至1947年，在重慶擔任**新華日報**副社長等職，中共建政後歷任全國文聯委員，作協書記處書記。又如周揚，他早在1930年代即已是中共在上海左翼文聯的主要代表，參與延安整風之後，歷任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等職務。像何其芳、周揚之類的人，當了官之後，還有多少知識份子的成分，或有爭論，在此無意深究。重要的是，1927-1936年、1936-1942年這兩個時期加入中共的知識份子，不論是由於中共的政治發展需要，或者是年齡梯隊的原因，再也難以往更高的權力位階發展（主要即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建政之後，成為實際直接領導各種各樣知識份子領域的上級幹部。例如周揚，反右運動時正任職文化部，反右運動前和反右運動中許多大批判的個案都可以直接連繫到他。²³而何其芳，反右運動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實際在知識份子的圈子中劃定他人成為右派者，多半出於此等人。²⁴

抗戰軍興之後，中共大力宣傳抗日，並在大後方重慶展開統戰工作，加上國民政府舉措失當，又使得許多原本夾在國共兩黨之間的各黨派人士，甚至是國民黨的要員，從支持國民政府，日漸轉向同情並支持中共。這些人當中許多是知識份子，論起年齡、經歷和輩分，往往都比周揚、何其芳等人還高上一、二輪以上，早已是社會上的名望之士，如沈鈞儒、馬敘倫、馬寅初、邵力子等，他們在政治上最初都不認同中共，更遑論是馬克思主義，並且早在中國社會負有高度聲望。對於這些知識份子，中共自是不會將其視為可以改造成黨員、直接為之所用之人，而是透過抗日的號召，藉由他們的社會聲望，增加中共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²²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引自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頁238。

²³ 最有名的便是胡風案。

²⁴ 不過，中共管理知識份子的相關機構，除了上述這一類的直屬機構之外，還根據單位特性分屬其它組織，如北京大學又受北京市委管轄。因而實際上的權責和管轄，可能更為複雜。

而馬寅初在這一類人當中，又顯得很不一樣。首先，他是無黨無派人士，因此中共建政之後，他不屬於八大民主黨派的任一個組織；其次，他的學經歷和其在中國財經界、經濟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對於中共建政初期的經濟重建，不論是原則方針或是具體措施，中共倚之甚深，遠非其他民主黨派的角色所可比擬；最後，中共建政後，他自覺地閱讀馬列主義相關著作，企圖將自身所學與馬克思主義連結，又與上述這些人大不相同。關於最後這一點，馬寅初倒也不是孤立的個案，因而在 1950 年代形成了一群「傾左知識份子」的群體。這些傾左知識份子，許多人在 1950 年代各種政治運動中表現突出，在反右運動時卻遭遇了不同的命運。

第三節 傾左知識份子群體的構建

1949 年中共建政，中共的角色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因而如何對待知識份子，也有不同的考量。

周恩來於 1956 年 1 月在「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說：

在社會主義時代……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份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兄弟聯盟。……在高級知識份子中間，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進步知識份子約占 40% 左右；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夠完成任務，但是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也約占 40% 左右；以上兩部分合占 80% 左右。在這 80% 以外，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後分子約占 10% 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占 9%。²⁵

在 1957 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毛澤東也提出了他對知識份子的看法：

我國知識份子……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份子為它服務。……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份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

²⁵ 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308.htm。

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願意接受共產主義，對於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²⁶

從上述這兩段引文，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在看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上，偏重點有所不同。周恩來判斷知識份子的立場和態度，是從三個指標：一是擁護共產黨及其政權的程度，政策取向極其明顯；二是擁護社會主義，按周恩來自身對「社會主義時代」一詞的用法，社會主義一詞具體所指，是中共建政之後對社會生產關係改變的作為，連帶地對社會各階級的處理態度，因此這個指標也是偏重對當時政策制度的立場態度居多；三是為人民服務，這一點較為抽象，但是如果考慮到為人民服務的前提是必須有工作、有職位的話，那麼仍然是跟前述兩項相符的。這也是為何魏承思認為周恩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也具有工具化的重要證明。可是，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的政治立場，從「知識份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說法來看，相較於周恩來，一方面標準更為嚴格，不是從知識子的工作態度上來看，而是從他們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來判斷；另一方面，儘管毛澤東在知識份子的對待問題上也有著工具化的傾向，但是他似乎更在意的不是他們對現行政策措施贊成與否、執行的績效如何，而是在思想上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否得到改造。筆者認為，上文述及中共在其發展的歷程中，日漸產生一種傾向，即「思想和組織的一致化」或「權力與真理的一體化」，到了 1950 年代之後，卻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上，產生了偏向上的差別：毛澤東較傾向於思想上或真理上的層面，而周恩來卻比較傾向組織上和權力上的關係。因此，毛澤東特別注意知識份子對於自身所學和內在思想理路的馬克思主義化。²⁷

在毛澤東的描述中，提到了當時知識份子群當中，有一群人正在試圖理解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如果了解從 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到 1955 年的反胡風事件和批判俞平伯、胡適等人的運動，官方介入、主動掀起的角色明顯，那麼不言而喻，這些開始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有許多人是受到了政治壓力的影響，被動成分居多。但是與此同時，卻仍有一批主動放棄或批判自身原有所學、主動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代表人物如藝文界的宋雲彬、老舍，哲學界的金岳霖、馮友蘭，經濟學界的陳岱孫、馬寅初等人。

²⁶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384-385。

²⁷ 當然，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的態度，在反右運動之後已有所改變，不再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抱持過於樂觀的心境，光是從「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從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院公開演講，到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其間的修詞和偏重點已有所不同。詳見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587-595。不過，毛周兩人對於知識份子改造問題偏重點的不同，仍是很清楚的。

宋雲彬早年都是擔任報紙或刊物編輯，日後對古籍研究有相當高的造詣。早在 1924 年就加入中共，但在 1927 年便與中共失去組織連繫。1945 年，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51 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文史館館長、體委主任以及省政協副主席、文聯主席，1957 年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在此之前，宋雲彬始終被民盟內部其他人視為左派，因為他的許多想法和觀念與中共相去不遠。例如在 1930 年代中共內部對於托派的爭議時，他與中共的意見更為一致，反對托派，同時也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延安中央。²⁸因此，1955 年中共人大浙江小組會議，他會起身反駁馬寅初，斥之為馬爾薩斯主義者，就不是什麼不能理解的事了。不過，宋雲彬可能怎麼也沒想到，他批評的馬寅初後來並未因此被劃為右派，反而在 1957 年初的整風期間，他因為批評中共「不應黨政不分」，「要信任黨外知識份子」等意見，卻被劃為右派。1960 年，他自己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自問平生同情革命，堅持正義，徒以嫉惡太甚，橫遭物議。」即使被打為右派，他也不改其志，「縱不能盡如人意，亦庶幾無愧我心」。²⁹

老舍原名舒慶春，旗人之後，1920 年代一度受洗成為基督徒。1938 年，他參與「中華全國文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這個組織是中共在抗日大旗下吸納武漢的文化界人士而生，由周恩來指示共產黨員陽翰笙等人籌備組織。當時的老舍與國內政治關係甚為淡薄，他自認：「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抗戰我就跟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從他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情況，也的確如此。抗日戰前，老舍就以長詩暗諷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抗戰之後，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便一改之前的態度，毫不掩飾地歌頌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³⁰然而在「文協」工作日久，與周恩來等人的長期交往，老舍日益對中共有所好感。中共建政後，老舍由美國回到中國大陸，不久獲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1950 年代，老舍的新劇作「龍鬚溝」、「春華秋實」等，開始歌頌中共建政的政績，暗示資本家要接受改造。他強調，「我們得先作個社會主義的人，而後才能作個社會主義的作家」。其實，老舍自己都很清楚，中共建政之後的上述作品，論質量而言，都比不上他早期的作品，但是他覺得中共建政之後，他有一股熱情不吐不快，他稱之為「熱愛今天的感情」。同時他認為，「我的失敗不在於我要寫當前的新事物，而是在於對新事物了解得不夠，寫作方法也欠妥當」。因此，他認為，只要他更下工夫體驗下層民眾的生活，「熱愛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熱愛今天的人，我們就不愁寫不出東西來。」³¹

文化界的人士，只能從其外在作為來看待他們的政治思想的變化，而學術界

²⁸ 王凡西，「懷念宋雲彬與許志行」，**陳獨秀與中國革命網**，www.chanstudy.com。

²⁹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頁 662。

³⁰ 史承鈞，「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國民政府抗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2007 年第 4 期，頁 38-42。

³¹ 老舍，「熱愛今天」，**老舍雜文集**第十六卷，**龍騰世紀書庫**，<http://www.millionbook.net/mjl/laoshe/zw16/052.htm>。

人士就能從其內在的思想理路進行分析。金岳霖，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早年的哲學流派是西方邏輯實証論的系統，羅素（Bertrand A. W. Russell）的實用主義哲學對他影響很大。後來他又對中國傳統形上哲學發生興趣，並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對馬克思主義殊少好感。可是到了 1950 年代，金岳霖不但否定了自己的過往成就，宣稱要當一年級的學生，從頭學習馬克思主義。1955 年，或許是順應批判胡適的風潮，金岳霖開始著文批評羅素和杜威（John Dewey）並重新檢討自己早年的哲學著作。³²以他的個性，論者大多不認為他會是爲了求官而寫作這些作品的。以下各引兩段金岳霖的自我剖析：

在 1940 年以前，我是比較模糊的〔指對於經驗歸納在邏輯學上的地位問題〕。我的出發點也和休謨（David Hume）、羅素的出發點類似，在歸納問題上跟他們走了一大節的路。我那時也認為，甲 11—乙 11，甲 22—乙 22，甲 33—乙 33 等等中是沒有必然性的，它們既不必然地蘊涵一種概括，而概括出來的東西本身也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資產階級的邏輯學家只好利用「例海戰術」，只好從例証數量上的增加去減少概括的或然性。……就我個人說，這個問題是老早就提出來的。……我似乎表示出我的看法和休謨、羅素的看法不完全一樣。這當然只是大同中的小異。從唯物主義者來看，問題根本不在無關緊要的小異，而在邏輯理論路線上的大同。這個「大同」是什麼呢？最簡單的說法是一句話：事實沒有必然，只有形式邏輯有必然。……受了這個影響的人，慢慢的把歸納排除在形式邏輯之外了。³³

解放前，我也有我不可「犯」的「尊嚴」，我的「尊嚴」雖不那麼廣，但是在「哲學」上我很頑固。只承認不同的意見，不太容易承認錯誤。要我在大庭廣眾中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很困難的。這是我的個人主義在作祟。先進的哲學工作者艾思奇、胡繩、孫定國等同志彼此提出批評，而又樂於接受批評。他們的尊嚴並未因此而減少。我參加了這樣的討論會，受到很大的教育。³⁴

這兩段話，分別顯示出金岳霖在思想和態度上的變化，也點出了變化的時間點。儘管動機不明，但從上引這兩段文章的內容，可知金岳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吸收，絕非表面功夫。如果我們仔細推敲金岳霖的自我批判，對於自己的認識論的反省實是非常深刻細緻，與那些被中共批評、只好承認錯誤、寫應付了事的反省文章，不論在深度和邏輯性上，顯然有別。1956 年，中共通過金岳霖申請入黨。

³² 胡軍編，**金岳霖選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6。

³³ 金岳霖，「對舊著邏輯一書的批判」，引自胡軍編，**金岳霖選集**，頁 560。

³⁴ 金岳霖，「我怎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引自陳占安等編選，**馬克思主義與北京大學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510。

至於馮友蘭，只消看一看他自己寫的回憶文章，便可知其梗概：

我同毛澤東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是在 1949 年 10 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我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過了幾天，……，毛澤東派專人給我送回信來了。信的原文是：「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當時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鍛煉，我現在才開始懂得這句話了。……學習馬克思主義，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它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難了。要想真正應用它到實際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得馬克思主義「化」了才行，這樣的「化」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沒有這樣的程度，而要重新寫**中國哲學史**，那也不會新到哪裡，充其量也不過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採取老實態度，那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嘩眾取寵。³⁵

本引文摘自 2005 年的**書摘**雜誌，而**書摘**雜誌並未標示這是馮友蘭何時的意見，而馮友蘭也早在 1990 年即已去世。不過從文句中「經過三十多年的鍛煉」推敲可知，這篇文章的寫作，已是 1980 年代中末期，當時中共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出爐，改革開放已有多時，思想氣氛也比較寬鬆，並對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提出批判，馮友蘭可以實事求是的講問題，沒有什麼必要在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的問題上多所迴護，何況他又非中共黨員。以他對中國哲學的造詣，加上多年的體會，寫下了這樣的文章，自是對「馬克思主義化」的問題有著深刻的體認。另一方面，從上引文字可知，照他自己所說，中共建政後，儘管馮友蘭對這個問題理解的太輕鬆，但他的確是極力想要往這個方向努力的，因而也絕非那些只求在政治上應付了事的人。

陳岱孫的情況，恰可與馬寅初作一對照。陳岱孫比馬寅初小八歲，兩人同是庚款留學生，馬寅初回國之後（1915 年），陳岱孫才出去讀書（1920 年）。就學問的偏向而言，馬寅初更多在意中國現實的財經事務，而陳岱孫則致力精研各派理論。學成回國之後，馬寅初先是任教北京大學，又前往浙江大學，陳岱孫則一直任職清華大學經濟系，抗戰時期便到西南聯大。據陳岱孫的說法，剛回國時，也曾有志於革命（但不知此一革命所指為何，是國民革命或階級革命）。可是不

³⁵ 馮友蘭，「我同毛澤東的幾次交往」，**書摘**（北京），頁 9-11。

久情勢一夕多變：國共分裂，寧漢分裂，閩變等一樁接著一樁，徹底打消了陳岱孫從政的念頭。抗日戰爭期間，多年精心編寫的財政學手稿毀於戰火，因而轉去做西方經濟思想史，再也不去跟進外國的前沿研究。這一領域，陳岱孫一直固守到老。由於中共建政之後，課堂上不能再講「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於是許多受西方經濟學學科訓練的人，包括趙迺搏、巫寶三等，也都紛紛鑽研起了經濟思想史，經濟思想史成了惟一保留一點西學思想的學科。³⁶

相較於馬寅初，陳岱孫公開問世的作品就少很多。如果檢視陳岱孫在 1930 年代的相關公開文章，便可發現，首先，他較多談論經濟問題，而少談政治等其他問題；其次，他對於國家財經舉措的評論，論點與馬寅初極為相似：都強調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經濟自主權、合理處理外債、建立國家貨幣信用等，這些大都屬於國民經濟學的討論範圍。可是到了 1947 年，在「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一文中，陳岱孫首次討論了資本主義與自由經濟、社會階級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命題：

在今日自由經濟發展的國家，財產所得分配不平的情況太為眩目了。經濟自由主義接殖自政治自由主義，只注意裁抑國家對於人民的暴力，而不想到經濟的不平等可以產生個人的暴力；只注意到政治階級之應鏟除，而不想到新階級之不平等可以在經濟範圍內產生。近代人民經濟生活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經濟平等的要求似乎更迫切於政治平等。甚至於有人以為沒有經濟平等也就沒有政治平等。18 世紀的政治自由主義是裁抑國家，怕它變成壓迫人民的暴力，而自由制度之下的新經濟貴族——資本家——不但受裁抑，並且可以利用經濟的力量壓迫國家。³⁷

雖然當時陳岱孫對資本主義有所批評，但是他對於社會主義也是有疑慮的：

經濟權力歸諸國家之後，在經濟自由主義制度之下，個人與個人間，以優越經濟地位，互相凌駕的不平等情形，也許因之消滅。而代替之者則為國家權力凌駕人民的情形（自由主義所力謀鏟除者）的恢復。……政權，在此局面之下，是一切野心權力的鎖匙，是聰明才智之士所必爭之事物。賭注這樣高，競爭這樣烈，……民權機構——民意，選舉等等——恐怕有不能負荷而破折的危險。³⁸

從上述引文可知，即便時序來到 1947 年，離中共建政不到兩年之前，陳岱

³⁶ 關於陳岱孫的生平，詳見梁捷，「馬寅初與陳岱孫」，萬科電子周刊，第 485 期，2006 年 1 月 9 日，<http://www.vankeweekly.com/main/magazine/Article.aspx?ArticleID=63913>。

³⁷ 陳岱孫，「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引自晏智杰編，陳岱孫文集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 458。

³⁸ 陳岱孫，「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引自晏智杰編，陳岱孫文集上，頁 458。

孫仍不是十分贊成社會主義。但是在 1958 年馬寅初的問題發生時，陳岱孫參與了北京大學成立的「人口問題研究小組」，這個小組是把馬寅初的人口研究觀點作為對立面，並出版專書批判馬寅初。

此外，中共建政之後，陳岱孫的專業仍是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三十多年來課程講授的講義，日後經過多次改寫和完善，於 1979 年正式出版，即**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這本書的內容，通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評價、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派。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價值學說」，除了評述古典經濟學各家各派的論點及其缺失之外，同時非常正面評價了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地位；第二章為「剩餘價值學說」，即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觀點，作要點之介紹；第三章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學說」，不論從問題意識到各節的要點，無一不是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的理論來進行說明。至於第四章，名為「經濟危機學說」，更為明顯，同樣的問題，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從李嘉圖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只承認資本主義會有景氣循環，不會有經濟危機。而陳岱孫直接稱之為經濟危機，其實便已告訴讀者自己經濟學的思想立場。陳岱孫這許多的觀點，一直到 1990 年代，即使他已表態支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有許多觀點仍未改變，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地位。這顯然與 1930、1940 年代的觀點大不相同。

上述這些人，儘管各自的生命歷程當中有若干差異，如宋雲彬的思想改觀，可能是上述這些人當中最早的，即 1920 年代，可是在組織上，脫離過中共，之後也不再回到中共組織中，而是成為民主黨派（民盟）之人。但是這些人在其生命歷程中，大體上跟馬寅初一樣，從一個對中共無甚好感、對馬克思主義陌生甚至反對的人，並在早年就已有一定的社會、學術聲望。歷經 1940 和 1950 年代，轉而成為支持中共、認同馬克思主義之人。政治態度上同情、支持中共，或許可以從大環境的變動、使他們對中共改觀來解釋。若光只從這一點來看，八大民主黨派中人所在多有。可是思想上要把自身藉以成名之舊有學思成果，某種程度上放在一旁，或以馬克思主義的標準重新檢視一番，或直接接受馬克思主義，殊為不易。尤其這些人在其思想產生改變之時，大多已然是中年以後，人生觀和思想已經成形，要再進行大改變，難度就更高了。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把他們作為有別於「黨化知識份子」和「自由知識份子」的另一種知識份子的類型，即「傾左知識份子」。

然而，馬寅初會認同中共和馬克思主義，又是很奇特的。因為論起年紀，馬寅初比起上述各人，至少都大了七、八歲，這個差距使得馬寅初學成歸國之後，北洋政府尚未倒台，在政治角色而言，北洋政府仍是中國政治正統，各國對中國的外事交涉對象，仍是北洋政府，廣州革命政權尚屬叛亂組織。跟馬寅初同時期

之人，如果在中共建政之後仍然健在，並且留在中國大陸的話，要他們在組織上認同中共，或認同由中共統治中國，畢竟形勢比人強，也算有可能，但是要在思想上認同馬克思主義，就頗為不易了。尤其是馬寅初本身的個性，又與組織化的中共不太搭調。首先，馬寅初是清朝末年由政府資助出國留學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屬於中國較為早期的留學生，有中學的底子，又受到西學的衝擊，這些知識份子回到中國後，早年或者以實業救國為入手，如詹天佑；或者從政，如梁敦彥。³⁹馬寅初的經歷則較為複雜，回國初期與政治的關係並不密切，也沒有從事實際工商實務。除了曾在北洋政府擔任過短暫的職員工作之外，後來的大半生多在學院之中，但又不是像陳寅恪一般全然的學院型學者，他曾經與人創辦「中國經濟學社」，發表各種學術性和時論性的文章，並且始終有著許多兼職，官民頭銜都有。

其次，馬寅初在早年中國的留學生當中，是少數攻讀到博士學位的人，又是極少數以西方作為研究主題撰寫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名氣之大如顧維鈞、胡適、李濟等，皆是以中國的主題而獲得學位。⁴⁰上述這些人回到中國之後，在自身的領域中都大放異彩，學位的取得過程，並不影響其貢獻與地位。然而以當時的難易程度而言，以西方自身的主題作為博士論文題目，的確是較為困難的。馬寅初一反民國初年的中國留學生風氣，以西方作為其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不隨流俗的個性。⁴¹

更重要的是，馬寅初勇於反潮流、不畏權勢的性格，在中共建政前已表露無疑。不論是 1920 年代對軍閥亂政的批評，或是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質疑財政部各種討好四大家族、損公肥私的財政措施，或是在浙江省擔任省府委員期間強力執行掃毒和禁賭，乃至於抗戰期間一系列抨擊官僚資本和發國難財者的文章和演講，不但立場和觀點終如一，言行也極為一致。

馬寅初對中共和馬克思主義的改觀，就具體的經歷上，關鍵似乎在於 1939 年。「重申我的請求」發表於 1960 年 1 月，當時正是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和「團團轉理論」遭到批判的末期，本文正是馬寅初最後一篇能夠公開發表的答辯文章。其中有一段話：

有的人還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來作為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證據。挖老根，那是挖不勝挖的，這筆賬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費心。不錯，

³⁹ 詹天佑學成後參與建造了第一批中國鐵路，如唐津、津榆、新易、京張等線；梁敦彥曾任清末外務大臣。

⁴⁰ 顧、胡、李、馬的博士論文題目分別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中國邏輯思想的演變」、「中國人的基礎：人類學的探索」、「紐約市的財政」。

⁴¹ 民初留學風氣與文化，詳見趙毅衡，「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研究——現代留學史筆記」，BBC Chinese，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newsid_1231000/12314172.stm。

在 1939 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做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所以對 1939 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負責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自那年起直到現在，我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挑撥離間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⁴²

因此，有必要了解此一時期對馬寅初的影響。

1937 年，馬寅初前往重慶大學任教。在此期間，他親眼目睹許多國民政府高層的政經舉措失策，以及不肖商人和資本家發國難財的行徑。在此期間，他發表了「論戰時過分利得稅」（1938 年 5 月）、「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1940 年 7 月）、「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為我國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1940 年 10 月）等時論性文章。這一類時論文章，批評的對象都是一致的，即在戰爭期間趁勢而起並獲利甚豐的商人和資本家，但是從文章的標題來看即已很清楚，馬寅初對於這些人的指稱措詞卻日漸強硬（直呼「發國難財者」），對此一問題的估計也日漸嚴重（從「戰後復興經費」之補充到「中國財政金融的唯一出路」）。⁴³從這裏可以看出馬寅初對時政與時局的看法日趨激進。

在重慶期間，由於個性外向海派，馬寅初也多與各界交遊，其中有一位是沈鈞儒。⁴⁴沈鈞儒是浙江嘉興人，1932 年參加宋慶齡、魯迅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思想日漸親共。1935 年號召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當時因主張抗日救國而被逮捕入獄的著名「七君子」之一。1941 年參加組織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日後八大民主黨派中的「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前身。1939 年時，透過沈鈞儒的介紹，馬寅初認識了時任重慶**新華日報**的編輯許滌新。許滌新是中共建政後著名的經濟學家，建政前則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經由許滌新與馬寅初關於經濟學的長談論辯，馬寅初對於中國的經濟問題以及中共的經濟主張的想法似乎產生了若干變化。儘管目前無法得知詳細的情形，但是，透過許滌新的引介，馬寅初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和王若飛，在與周恩來的交往過程中，加深了他對中共的好感。⁴⁵至於 1940 年馬寅初被關、後又遭軟禁、獲周恩來營救之後，馬寅初與中共的關係更進一步，自不待言。故而 1940 年之後，馬寅初的文章，已出現在**新華日報**上，成為中共的「同路人」。

可是，像馬寅初這樣一個知識份子，西方經濟學有極深的造詣，政治上同情

⁴² 朱正直編，**馬寅初演講與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68。

⁴³ 馬寅初，**馬寅初演講與論文集**，頁 85-88，99-105，106-113。

⁴⁴ 馬寅初常在公演時或對初見面者自稱「兄弟我……」，可見其個性之一般。詳見孫紹振，「我不在乎給我洗冷水澡——馬寅初的硬幽默」，**解放日報**（北京），2004 年 9 月 26 日，第 8 版。

⁴⁵ 鄧加榮，**馬寅初傳**，頁 25-27；29-31。

中共尚未足為怪，但是要在經濟思想上認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首先就必須有一個自我說服的過程。馬寅初從經濟學的原理以及由中國的社會現實出發，不贊成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也不贊成中國在經濟制度上仿效蘇聯，這是很清楚的。到此時（1940年代）為止，馬寅初的經濟思想，仍然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有兩件事可以為証，一是1947年他所再版的**經濟學概論**一書。這本書是馬寅初在中國廣為流傳的一本經濟學教科書，1943年重慶初版，1945年上海再版，1947、1948年上海增訂到第七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從其版次便可知道，這一本書對當時中國經濟學界的影響力。在第七版增訂版的序言中，馬寅初還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大加維護：

又近來頗有主張改變經濟學教本者，他們以為今日各大學所用的經濟學課本，多自歐美課本轉移過來的，鼓吹資本主義，不遺餘力，亟應設法改革，灌輸社會主義的思想以糾正之。此種說法，驟視之，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細研究，殊屬不妥。吾人應該明白，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在中國並沒有過時，不但沒有過時，且還沒有開始。吾人現在在經濟上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危機，並不是由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得太快而來，乃是由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得太慢和太遲而來。在自由資本主義已經沒落，獨佔資本主義已經抬頭的英美，否定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應時而來的，但以這種批判盲目地移用之於中國，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為害不可勝言。在一黨專政之下，論壇上不檢討如何發展自由資本主義，反儼乎其然地批判自由資本主義，殊不知中國並不是走在資本主義的前面，乃是落在牠的後面。歐西的資本主義，是從打倒封建勢力的爭鬥中產出來的，中國不能視為例外。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尚未從束縛生產力的鐐铐中解放出來。農民被網縛於貧瘠的土地，終歲不得飽食暖衣，辛勤所得半由地主官僚搶奪而去，遇要把一切戰事的負擔壓在饑餓的農民身上，這是束縛農民生產力的鐐铐。不把這副鐐铐解脫，農民永無翻身之餘地，而中國亦不能踏入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⁴⁶

從這個序言當中可以看到，馬寅初仍是主張在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固然有所本，但不能據此取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寅初也受到當時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把歷史五階段論作為其立論根據。另一方面，有感於中國經濟發展與政治動盪，馬寅初當時對中國經濟發展前途的看法，也不是一味地要求中國往資本主義發展，而是某種程度的混合式經濟：

我們不完全採用英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制度，亦不完全採用蘇聯社會主義一切國營的制度，乃提出一種混合經濟的制度，官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同時並

⁴⁶ 馬寅初，**經濟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3-4。

進，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設，是不合時代的需求，完全用蘇俄式的建設，是非中國所能辦到的；故不得已採用混合制。⁴⁷

這樣的看法，馬初在 1930-1940 年代都曾表達過。其實這樣的想法，在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間頗為盛行，這不單是馬寅初個人的看法，某種程度也反映了當時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在面臨中國內外的嚴峻局勢之下，所呈現的思想狀態。早在 1933 年，**申報**曾就中國現代化問題向社會各方面知名人士徵文，在收到的 26 篇短論和專論中，絕大多數主張走有限度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道路。大體統計，主張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僅 1 篇，傾向於蘇聯社會主義方式的有 5 篇，主張採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之長，即混合方式的，有 9 篇，其餘未正面或明確回答。⁴⁸**申報**的全名是**申江新報**，出版地在上海，初為英商所辦，先後由史量才接辦（此徵文活動係在史氏時代舉辦）。**申報**在當時影響力頗大，發行量達 15 萬份，是中共建政前歷史最久的報紙（1872-1949）。因此，**申報**的調查結果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⁴⁹

對於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在經濟制度上的這種轉變，1936 年以前的中共，自身存亡未卜，可以說是毫無所悉，也無心於此。然而 1936 年西安事變以後，陝北根據地從政治和軍事的高度壓力當中釋放出來，獲得喘息，中共才開始重新注意爭取民心的各種工作。1937 年 7 月抗日戰爭爆發，中共隨即於 8 月召開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⁵⁰1927 年 5 月，中共五大在清共之後的身心情緒，在農村中「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公司的土地」、「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取消地主紳士所有的一切政權及權利」等措施，此後始終是中共的農村政策，因而頗為激進。到了 1936 年，總算採取了比較和緩的方式。至於在城市工商經濟方面，由於中共的地盤皆在農村，對城市情形了解有限，當時只提出「廢除苛捐雜稅」和「救濟失業」，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這兩種政策精神，純然只是善政思想，而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直要到國共內戰開打，中共奪取了若干大城市、建政有望之後，開始思考該如何處理城市經濟，進而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方針。毛澤東在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的段落中指出：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

⁴⁷ 馬寅初，「中國經濟之路」，**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頁 346。原文於 1947 年發表。

⁴⁸ 羅榮渠等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 14-15。

⁴⁹ 詳見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⁵⁰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30/content_2276671.htm。

別……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共和國）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而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的段落中，毛澤東又提出：

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⁵¹

此一政策宣示中，毛澤東強調「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又說「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不再強調蘇聯的社會經濟模式，其實質也是混合式經濟。此一說法不論係發自中共自身對中國情勢的理解，或是探詢過其他人的意見，這樣的主張，應是符合當時中國多數知識份子的看法的，即改變了自 1927 年中共五大以來所決定的農村武裝割據、城市工人暴動的路線。⁵²

「新民主主義」方針的出現，在政治上極為有效，它不僅替中共爭取到許多知識份子，也爭取到許多社會上的中堅份子，如李鼎銘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等。⁵³因此，從大政方針的角度來看，由於中共的國內政策調整，對於馬寅初政治立場的改變，提供了大環境的因素和可能性。

綜上所述，如果考察馬寅初留洋赴美之後到 1940 年代的大小事跡，以及在各種事件當中他的表現，似乎可見馬寅初最終走上親共的道路，係由於其獨特的生命經歷和性格所致，因而只是眾多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例証，不足以論証抗戰期間「傾左知識份子」群體的存在。然而大環境的變遷，尤其是他對 1930 年

⁵¹ 兩段引文詳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中共中央毛澤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636，639。

⁵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215-235。

⁵³ 詳見程美東，胡尚元，「抗戰時期的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2007 年 3 月，總第 23 卷第 1 期，頁 117-123，161。

代國民政府政經舉措的不滿，以及中共的內政方針的變化，使得馬寅初的學思脈絡與「新民主主義論」的思路趨於一致。不論是中共的宣示，或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見，還是馬寅初的看法，馬寅初從反共走向親共的立場轉變，似乎又不是那麼偶然。另一方面，從馬寅初的思想變遷過程中，儘管可以看到許多部分出於中共統戰部門的拉攏作為，例如周恩來為營救馬寅初所提出的公開呼籲，以及馬寅初透過沈鈞儒與沈志遠、許滌新等人的晤談。但是不可否認的，馬寅初本身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理念，以及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藉由中共「新民主主義論」這樣的政策宣示催化，終於使得馬寅初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重新作出抉擇，成爲一個「傾左知識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層與知識份子的互動。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這 5 人爲例，1940 年代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份子，跟中共關係的建立，乃至於本身的立場轉變，多數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這當然與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的統戰工作有關。中共建政之後，統戰部負責處理與民主人士的關係，周恩來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分管統戰業務的主要負責人。其他四個中央常委，除了毛澤東之外，通常極少跟黨外知識份子有私人性交往。⁵⁴至於就馬寅初的個案來說，陳雲與馬寅初由於建政初期中國大陸和上海財經工作的關係，來往較密，而朱德作爲中共中央常委，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此，在中共五位中央常委中，與馬寅初的關係最爲疏遠者，要屬劉少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可以從側面了解這 5 名中共中央常委當中對於馬寅初事件的態度。

從黨外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的遭遇，不太一樣。以本文所討論的對象而言，金岳霖和陳岱孫算是最幸運的，他們二人在文革之前，可以說是無風無浪，並且在自己的專業上，盡力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也參與了一些知識份子圈中的批判活動——當然，是批判別人而不是被批判。老舍的地位也絲毫不受動搖，自己的政治熱情在文革前依舊高昂。儘管在創作上有所顧慮，但仍然盡力「熱愛今天」。宋雲彬算是其中最倒楣的，反右運動之前極力緊跟中共政治風向，卻因整風時期說了一些話而被打爲右派。馮友蘭雖然一心想把自身所學馬克思主義化，1957 年「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文章，還提出「一個命題有其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例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其抽象意義可以繼承，而且實際上我們已經繼承了」，企圖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尋找中國傳統哲學的地位，可是在 1958 年學術界中的「興無滅資運動」，跟馬寅初一樣，在校園內變成了反面教材，供人批判。

以馬寅初的情況來看，根據第三章的討論和分析可知，關於「新人口論」一文的論辯雙方，其實就其內在精神而言，都有企圖表明自己的論證和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實際上，論點各自有其片面性。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一旦在知

⁵⁴ 像馮友蘭，比起跟周恩來，他跟毛澤東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

識份子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爭論時，由誰來判斷誰是誰非？

就中共的實際歷史情況來看，往往是由各級黨委來決定的。以馬寅初的例子而言，北京大學的校長，一方面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可以決定，高等教育部也可以決定；民主人士的身分，統戰部可以決定。結果是，統戰部方面被周恩來擋了下來，高等教育部在此一事件當中，似乎未扮演任何角色，而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就成了真正的政治壓力來源。康生後來的作為，也是直接跟北京大學黨委連繫的。因此，在馬寅初的案例中，權力與真理都扮演過仲裁角色，但是最終是權力決定真理，而且是某一種或某一派的權力，決定了真理。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本章上文所提出的中共「權力與真理的一致化」過程，那麼可以說，既是權力，又是真理，決定了是非對錯。

至於「新人口論」當中有關消費與積累的經濟論述，則必須與當時中國大陸的政經環境與政策背景相對照，方能了解。這將是第五章的重點。

